啟示錄中的暴力語言與非暴力抗爭

辛惠蘭
中國神學研究院
China Graduate School of Theology

一　引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我們留下一大堆殘暴血腥的回憶。納稅德國對猶太人的摧殘、原子彈下的生靈塗炭；跟我們較接近的，還有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三年零八個月的民不聊生等等，統統都成為人類歷史不可磨滅的污點。可歎的是，二次大戰結束七十年後的今天，人類似乎並未從歷史吸取教訓，內戰、種族滅絕固然時有所聞，近年崛起的伊斯蘭國，更公然以最原始殘酷的手段，加之於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身上，都在延續人類彼此殺戮的劣根性。

更遺憾的是，在過去的歷史中，啟示錄不時被用作人類相互殘殺、向他者施以暴力傷害的借口，[1]不少學者亦以為，啟示錄在鼓吹暴力和報復

[1] 參例Wes Howard-Brook and Anthony Gwyther, *Unveiling Empire: Reading Revelation Then and Now*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9), 1-15的概述；亦參Loren L. Johns, *The Lamb*

心態，例如葛臣（John Dominic Crossan）就曾聲稱，基督徒須從馬可福音中的「非暴力耶穌」和約翰啟示錄中的「暴力耶穌」之間，作出選擇；[2] 約翰斯（Loren Johns）基於書卷過往曾產生的效應，也承認啟示錄「可以說是基督教歷史中最危險的書卷」。[3]

不過，如何詮釋和理解啟示錄看似暴力的語言和圖像，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閱讀的起始點和進路。[4] 如果讀者漠視作者自身的信仰立場和關注，只以隔岸觀火的旁觀者心態來閱讀，或許的確會以為，啟示錄的血腥場面在鼓吹報復或有違道德風尚，但這種對書卷的解讀，其實並未尊重文本原有的性質以及作者自己的原意和觀點，所以亦非全面和準確。

事實上，啟示錄作為一封在基督徒之間往來的書函（一4），溝通雙方有着共同的信仰，分享着共有的特殊神學背景和世界觀，正要求今天的讀者懷着同理心，進入作者主觀的思想世界，才能體會他獨特的信仰關注、對讀者的要求，以及期望所採用的文字要達至的修辭目的和效果。我們必須容讓文本自身塑造我們的理解，才不致誤讀書卷，對於評估啟示錄的道德含義，它有否在鼓吹報復心態，才能來得中肯。

因此，本文會從啟示錄的寫作目的和體裁出發，探討作者運用看似暴力的語言和圖像的修辭意圖和目的，繼而從作者和讀者共同的神學信念出發，分析這些語言對於讀者理解上主的性情和旨意，以至建立對上主的委身所起的效用。[5] 文章希望指出，啟示錄作為以天啟文學表達的抗爭性

Christology of the Apocalypse of John, Wissenschaftliche Untersuchungen zum Neuen Testament 167/2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186；Stefan Alkier, "Witness or Warrior? How the Book of Revelation Can Help Christian Live Their Political Lives," in *Revel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Apocalyptic Interpretation*, eds. Richard B. Hays and Stefan Alkier (Waco, Texas: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5-26.

[2] John Dominic Crossan, *God & Empire: Jesus Against Rome, Then and Now*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7), 217-18.

[3] Johns, *The Lamb Christology of the Apocalypse of John*, 186.

[4] Thomas R. Yoder Neufeld, *Killing Enmity: Violence and the New Testament* (Grand Rapids,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11), 11.

[5] 參Marianne Meye Thompson, "Reading Wha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oday," in *Revel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Apocalyptic Interpretation*, 159-60。

文本，它的主要目標是要透過顛覆性的意象，刺激讀者以另類眼光來觀看周圍世界：表面上理所當然的政治現實，其實是跟效忠上主相違的政治、宗教和經濟模式，要求讀者拒絕合作、持守忠心見證，甚至至死忠心。所以書卷中看似暴力的語言和喻象，並非在描述真實事件，而是象徵性的文字，[6]是要為讀者提供足夠的能量和動力，樂意接受抗爭可能帶來的苦難和逼迫等現實後果。

此外，信徒在書卷中眾多的聖戰場景中，其實從未採取主動的角色，甚至並未使用任何武力作自衛用途，更未參與任何實質的武力戰鬥。這些都在顯示，對於約翰來說，暴力並非人類解決問題的終極答案，亦非上主對世界的最終心意。

二　啟示錄的成書背景和目的

正如卡特（Warren Carter）所言，啟示錄要處理的問題，是當羅馬帝國的生活方式正影響生活的各個層面，基督徒作為一個被帝國釘十架的罪犯（耶穌）的跟隨者，他們應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跟帝國相處？[7]當中問題的核心，更在於當時的羅馬臣民，大部分根本並未留意從政權而來的壓迫和危機。

事實上，羅馬政權刻意將自己展現成對人民充滿善意，而啟示錄七間教會所在的西小亞細亞地區，更在帝國統治下享受着表面上的安定繁榮，都憑藉羅馬頻繁的商貿往來和龐大的市場需求，借機賺取巨大財富（參啟十八3、15、19）。[8] 另一方面，帝王亦似乎給予地方相當多的恩惠，跟地方城市維持着穩定關係，正如薛特（Dwight Sheets）形容，羅馬的統治是

---

[6] 參Alkier, "Witness or Warrior?," 140。

[7] Warren Carter, "Accommodating 'Jezebel' and Withdrawing John: Negotiating Empire in Revelation Then and Now," *Interpretation* 63(2009): 32.

[8] Craig R. Koester, "Revelation's Visionary Challenge to Ordinary Empire," *Interpretation* 63(2009): 11-12.

「得到允准的霸權或支配」；[9] 只要跟羅馬政權關係良好，對統治者表達感激，地方就能享受稅務寬減或大型基建等好處。[10]

最能幫助城市對帝國和君王表達感激的，就是帝王崇拜。能夠舉辦跟帝王崇拜相關的活動和節日，甚或為帝王興建神廟，是地方城市的榮譽，也是展示對帝國效忠、承認帝國和帝王擁有神明祝福的大好機會。[11] 地方貴胄亦樂意參與其中，甚至希望成為帝王崇拜的祭司，以助提升個人的社會地位。不難想像，帝王崇拜的節慶，亦是整個城市的重要社交活動：地方貴胄贊助的競技和體育比賽、盛宴和音樂表演，都在為地方提供食物、公共娛樂和就業機會。[12]

啟示錄七教會所在的城市，正是最熱切推動帝王崇拜的地方，當中五個（除卻非拉鐵非和老底嘉）設有帝王的祭壇、六個（除卻推雅推拉）設有帝王的神廟，亦有五個（除卻非拉鐵非和老底嘉）設有帝王崇拜的祭司。[13] 別迦摩早在主前29年，已獲准為帝王興建神廟（卡修斯《羅馬歷史》51.20.6–9），成為帝王崇拜的中心；以弗所更在市中心為當時還在生的多米田興建廟宇。[14]

不難想像，啟示錄七教會身處的地方，到處都瀰漫着帝國對政治、經濟和宗教生活的影響，都對信徒有着龐大的吸引力。事實上，從約翰致七教會的信（啟二～三章）所見，小亞細亞的信徒對於如何回應當前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情況，如何參與周圍社會，似乎並未完全跟約翰所期望的一致：一些似乎在享受着相對舒適的生活，亦樂意融入周圍社會（三1、17），亦有一些在見證上開始鬆懈，失落了起初對上主／基督的愛心（二

---

[9] Dwight D. Sheets, "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Revelation and Empire," in *Jesus Is Lord, Caesar Is Not: Evaluating Empire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 eds. Scot McKnight and Joseph B. Modica (Downers Grove, Illinois: InterVarsity Press, 2013), 203.

[10] Koester, "Revelation's Visionary Challenge to Ordinary Empire," 10.

[11] Judith A. Diehl, "Anti-Imperial Rhetoric in the New Testament, " in *Jesus Is Lord, Caesar Is Not*, 45.

[12] Koester, "Revelation's Visionary Challenge to Ordinary Empire," 10; David Barr, "John's Ironic Empire," *Interpretation* 63(2009): 22.

[13] Leonard L. Thompso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pocalypse and Empi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9.

[14] David A.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The Rhetoric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9), 42.

4），而在一些城市的基督徒羣體中，更有先知／教師教導信徒，可以參與帝王和偶像祭祠的宴會，吃當中曾用於獻祭的食物（二6、14～15、20），以便融入城市的社交和經濟生活。按着眼下的現實處境，這種應對策略看似合乎邏輯常理，不過在約翰眼中，卻在威脅信徒對上主的忠誠和單一效忠，亦妨礙他們在羅馬威權統治下作先知的見證。

所以約翰撰寫啟示錄的出發點是神學性的，是基於他對效忠上主的理解。在他看來，讀者不能同時敬拜上主又膜拜羅馬的君王和政權，亦不能同時效忠上主又全情投入帝國生活：「對上主不忠，難免要面對審判」，所以是關乎讀者最後是「生」還是「死」的終末課題，[15] 亦建基於讀者同樣已經接受的基礎信仰。如果進入約翰和他讀者共同的信仰思想世界，嘗試明白他們對特定語言符號的共同理解，書卷表面上看似血腥殘暴的審判敘述，對於溝通雙方來說，其實只是上主公義忌邪屬性的自然彰顯，亦本是信徒理解上主美善本質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約翰的敘述要達致的修辭效用，是要在看似無法抗拒的現實底下，推翻眾人對帝國生活和偶像敬拜的想像，推動讀者去作表面上並不明智的抉擇，放棄眼前的政治經濟好處，改變現有的生活方式，從文化適應中回轉。[16] 因此，書卷的語言和喻象，必須足以顛覆讀者對眼前現實的理解，重塑他們的想像和信念，[17] 所以亦必須具強烈的感染力和令人印象深刻，以致讀者能有足夠的能量和誘因，去抵抗世俗權柄懾人的吸引力。

約翰這些修辭目的，從他採用的體裁尤為明顯。

---

[15] Warren Carte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New Testament: An Essential Guide*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6), 109.

[16] 從約翰七次重複運用ὑπομονή （忍耐）這個字（一9，二2、3、19，三10，十三10，十四12），可見他自知要求讀者要作的抉擇，並非是容易的。

[17] 參Koester, "Revelation's Visionary Challenge to Ordinary Empire," 18。

三　啟示錄的體裁及其修辭作用

正如威瑟林頓（Ben Witherington）所言，啟示錄是「天啟式先知信息」。[18] 它基本上是一封由先知約翰發出，致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等小亞細亞七間教會的一封信（一4、11）。不過與此同時，約翰在書卷一開始就指出，他在傳遞耶穌基督的啟示（一1），而書卷更在五處地方提到所記的是「預言」（一3， 二十二7、10、18、19），並且將約翰的活動看成是「先知說預言」的工作（十11，十九10，二十二6、9），再加上它具有天啟文學的特式，啟示錄其實是集「書信」、「天啟文學」以及「先知信息」於一身的混合式體裁。

作為書信，書卷是要「按身處的地區，在真實的教會處境講述特定的問題」。[19] 約翰是有獨特的議程的；他要透過文字語言所起的修辭作用，說服讀者同意自己的觀點、影響他們的價值觀，並且誘發他們對公義的渴求，[20] 在誘人的帝國統治和看似無法抗拒的帝王崇拜面前，保持清醒，忠心持守見證。由於傳遞和接收雙方擁有共同的信仰，都在繼承同一套神學觀念和符號，旁觀者以為在鼓吹暴力的語言，對於羣體內部的接收者來說，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含義和解讀方式。

同樣，啟示錄作為先知預言，當中看似暴力的語言，亦必須從溝通雙方自身的共同符號世界和意識形態來理解。先知的信息，是要在一個充滿暴力和欺壓的世界，宣告真正合乎上主心意的另一個現實，當中對邪惡的審判，是為最終要成就的美好願景作準備，亦要警告子民，必須忠心以上主為世界真正的主，拒向帝國低頭。

充滿修辭能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語言和符號，正是書卷以天啟文學的體裁來傳遞先知信息的一部分。根據聖經文學學會（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天啟文學研討會的定義，天啟文學是：「帶有敘述構架的啟示

---

[18] 威瑟林頓著，陳又華譯：《還看啟示錄》，新視野釋經叢書（香港：明道社，2007），頁14。

[19] 威瑟林頓：《還看啟示錄》，頁14。

[20] Diehl, "Anti-Imperial Rhetoric in the New Testament, " 72.

文學，啟示是藉他世的存有傳給人類的接收者，要揭露時間（展望末世救恩）與空間（涉及另一超自然世界）的超現實」，[21] 所以亦要透過喻象和符號語言顛覆讀者的想像，開啟讀者察看世界屬靈層面的視界，將讀者未能看見的現實真相顯露出來，明白當下要作出正確選擇和堅持效忠的重要性。[22]

雖然當時有不少小亞細亞信徒正被帝國生活所吸引，但天啟文學的體裁卻要搖撼讀者的既定觀念，將他們眼下所見，以天上的觀點來重新詮釋和定義，暴露帝國邪惡的本質：[23]「羅馬和平」並非是和平的，眾人吹噓的帝國善意和對安定繁榮的許諾，都是虛構的假象。[24] 帝國只是一隻為魔鬼（龍，啟十二9）作傀儡的獸（十三4），參與帝國的活動和帝王崇拜，就等於參與敬拜邪惡，[25] 而帝國令人神魂顛倒的經濟成就，背後也只是對無數犧牲者的壓榨（καὶ σωμάτων, καὶ ψυχὰς ἀνθρώπων，十八13），參與其中，其實跟大淫婦行淫無異（十七2；十八3、9）。

因此，要理解啟示錄看似暴力的語言和喻象，必須顧及書卷天啟文學的特性。作者本身的關注，並非在於字面的精確陳述，而在於當中的象徵意義，是要透過形象化、誇張的圖像，讓讀者參與其中，去看約翰所看（εἶδον... ἰδο ，例四1，六5、8，七9，十四1、14，十九11），去聽（Ὁ ἔχων οὖς ἀκουσάτω，二7、11、17、29，三6、13、22；Εἴ τις ἔχει οὖς ἀκουσάτω，十三9）約翰所聽（ἤκουσα，例一10，四1，五11、13，七4，九13，十4），以致激起相應的情感和認同，[26] 樂於接受約翰看似不切實際，甚至是難以理解的信息。作者與讀者共有的符號世界和世界觀，以至文本自身潛藏的神學想像，包括對上主的主權和公義（以至最終必然勝過邪惡）的信念，[27] 才是決定文本語言和喻象含義的指標。

---

[21] 翻譯取自威瑟林頓：《還看啟示錄》，頁39。

[22]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70.

[23]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94.

[24] 留意「欺騙」（πλανάω，二20，十二9，十三14，十八23，十九20，二十3、8、10）、「說謊的」（ψευδής，二2，二十一8）、「說謊」（ψεύδομαι，三9）和「謊話」（ψεῦδος，十四5，二十一27，二十二15）等字眼，經常在書卷出現。

[25] Carter, "Accommodating 'Jezebel' and Withdrawing John," 44.

[26]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94.

[27] Thompson, "Reading Wha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164.

這些神學修辭要起的作用，包括提醒讀者要避免審判，作出跟自己信仰一致而又最有利的行動，正是約翰採用強烈戲劇性語言的目的，[28] 也是詮釋書卷表面上鼓吹暴力和報復的經文時，須要緊記的。

四　啟示錄中暴力語言的修辭作用

學者關於啟示錄血腥暴力的批評，主要在於書卷似乎在（1）嚮往極端暴力，例如上主的憤怒審判；（2）鼓吹對仇敵遭報幸災樂禍；以及（3）接納暴力和戰爭作為解決危機的方法。[29] 不過，如果從啟示錄作為信徒之間的通訊出發，尊重作者為要重塑信徒對上主的委身效忠、希望他們能堅持忠心見證的修辭目的，我們其實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當中的關注，再不是作者是否在嚮往暴力，而是上主的主權如何在地上彰顯；也不是信徒是否在幸災樂禍，而是他們對於上主最終要清除邪惡、公義得着伸張的願景如何得以實現；更不是暴力如何成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是當邪惡自招苦果的同時，上主如何仍展現祂憐憫和慈愛的屬性，實現祂對世界最終要達至真正和平的美善心意。

（一）上主的審判

正如高文（Michael Gorman）估計，啟示錄關於上主審判的敘述，約佔書卷一半的篇幅，[30] 包括七印（六1～八1）、七號（八2～十一19）、七碗以及之後對大淫婦的審判（十五1～十九6）、基督騎着白馬的審判爭戰（十九11～21）、最後對魔鬼的懲罰（二十7～10）以及白色寶座的審判（二十11～15）。當中的血流成河（例十九11～21）、被責罰者所經驗的痛苦（例九3～6），以至整個人類世界要面對的驚懼（例六12～17），的確令人膽戰心驚、不寒而慄，也是書卷備受批評的主因之一。

---

[28]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87.

[29] 例Michel Desjardins, *Peace, Violence and the New Testament*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62-92; Adela Yarbro Collins, "Persecution and Vengeance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n *Apocalypticism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and the Near East*, ed. David Hellholm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1989), 729-49.

[30] Michael J.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Uncivil Worship and Witness: Following the Lamb into the New Creation* (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11), 140.

不過，亦如前文所提，約翰的天啟語言和喻象並非字面的描述，而是象徵性的形象化表達，為要說服和推動讀者作出表面上看似不合常理的決定，所以亦必須具震撼力和令人印象深刻。書卷恐怖的審判場景，就是要在讀者心中激起震驚和敬畏的情感，提醒他們放棄對上主全然效忠的嚴重後果，透過將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未曾想像，但影響更深遠的終極危機，推動他們願意承受拒絕帝國生活可能引致的即時後果（例二13，六11，七14，十三15、17），緊記警醒遵行上主的命令，持守對主耶穌的信仰（十四12）的重要性。[31]

事實上，約翰除了展示上主審判的嚴厲，同時亦強調地上的災害，其實是犯罪、拒絕上主為世界設立的秩序和自然律而自招的苦果。在七印的異象中，首四個印釋放出來的騎士，他們帶來的災害涉及戰爭侵略的軍事力量（六2）、人民之間的彼此攻伐（六4）、經濟剝削（六6），以及緊隨這些而來的饑荒、疾病和死亡（六8），都是政權的軍事和經濟壓榨、人類自身的殘暴和貪婪的惡果。[32] 所以從書卷溝通雙方共同擁抱的基督教價值的角度來閱讀，這些人類自我摧毀的結局，並非是對暴力的期望，而是對上主的主權最終得以彰顯的願景。這觀點其實並非約翰獨有，而是在繼承舊約聖經認定上主要介入歷史，透過懲罰敵人，將地上邪惡橫行的情況扭轉過來的傳統（例賽十六4～5，六十三1～6；珥三9～21）。[33] 作為對世界有承擔、肯負責任的主宰，上主對自己為世界所設立的秩序必然信實履行，正符合對任何掌權者能賞善罰惡、維持社羣道德秩序的合理期盼。[34]

---

[31] 參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141;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109, 112.

[32] Carter, "Accommodating 'Jezebel' and Withdrawing John," 42；亦參Elisabeth Schüssler Fiorenza, Revelation: *Vision of a Just Worl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1), 63；J. Nelson Kraybill, *Apocalypse and Allegiance: Worship, Politics, and Devotion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rand Rapids, Michigan: Brazos Press, 2010), 102-3.

[33] Michael J. Gorman, "Shalom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God, Church, Judgment, New Creation," in *Struggles for Shalom: Peace and Violence Across the Testaments*, eds. Laura L. Brenneman and Brad D. Schantz (Eugene, Oregon: Pickwick Publications, 2014), 286；亦參William Klasson, *Love of Enemies*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4), 31，當中Klassen指出，在舊約聖經中，「耶和華的報復」其實在指那些人類經驗上主行駛自己主權的事件。

[34] Bruce M.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Understand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3), 57-58; Alkier, "Witness or Warrior?," 141.

不過，對於約翰和舊約聖經而言，上主最終的心意是要讓真正的公義與和平臨到人間，「審判和邪惡被清除」只是達致最後真正安定繁榮的前提，[35] 而非上主的核心關注，正如在淫婦巴比倫（十八章）、獸和假先知（十九20）、魔鬼（二十10）以及白色寶座的審判（二十11～15）之後，啟示錄真正的焦點，其實在於最後的新天新地和新耶路撒冷、上主的帳幕在人間（二十一3）、一切得着更新（二十一5）而無法容納邪惡（二十一27）的完美福樂。

因此，從約翰自身對上主的信念來理解書卷，審判其實並非最終目標，而是為了之後的拯救、醫治和更新，[36] 例如「地上的眾王」（οἱ βασιλεῖς τῆς γῆς），他們原本站在上主敵人的一方，本已被白馬上的基督殺敗摧毀（十九19～21），但在新耶路撒冷的敘述中，他們卻再次出現，更將自己的榮華帶到這城當中（二十一24～26），正好說明，約翰本身的關注並非在於殺害摧毀，而是萬物最終要得着轉化更新，[37] 審判只是當中一個必須的步驟。

所以在強調上主的公義和信實，不以有罪為無罪的同時，約翰亦不忘提示，上主最終的心意是人的回轉悔改。[38] 不少學者都留意到，在七號的異象中，號所帶來的結果（啟八6～九21），例如冰雹混着火、水變血、黑暗和蝗蟲等，似乎在呼應摩西要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時，上主降在埃及的十災（出七至十章），[39] 這十災的目的，是要帶來帝國（埃及）的悔改，容讓上主的子民離開帝國的欺壓。事實上，首四號和第六號只影響當中的三分之一，而第五號帶出的蝗蟲，亦只能帶來五個月這有限時間的禍害（九5），箇中原因在九章20至21節已清晰道明，是要讓人得到警告而悔改，回轉歸向上主；書卷之後出現的嚴厲災害和審判，只是人堅持擁抱罪的頑梗所致，正是讀者面對帝國生活的引誘，必須以之為鑑的。

---

[35] 參Gorman, "Shalom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286。

[36]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153.

[37] 參Carte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New Testament*, 127。

[38]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66.

[39] 例Kraybill, *Apocalypse and Allegiance*, 120-21；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64；Carte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New Testament*, 125。

無怪乎，約翰在七碗審判的敘事中，重複強調災害是降在那些並不悔改的人身上（οὐ μετενόησαν，十六9、11），啟示錄十六章5至7節也重複提到上主審判的公義。因此，雖然巴比倫受到的審判看似極為殘酷，尤其十七章16節提到，人要使這淫婦荒涼和赤身露體，又要吃她的肉和用火將她燒盡，彷彿的確在以暴力為樂。不過，既然巴比倫在象徵羅馬，[40] 那麼這些語言亦非在喧染真實的暴力，而同樣是象徵性的喻象，為要加強對讀者情感的影響，說服他們作正確合宜和對自己有益的決定，拒 效忠那註定失敗的大淫婦羅馬。[41]

雖然哥連斯（Yarbro Collins）聲稱，對巴比倫受責罰的期望，無可否認在受報復的慾望污染，[42] 但啟示錄十七至十八章指出淫婦的罪名，其實不單局限於對信徒的殘害（十七6），亦包括對人的經濟剝削（σωμάτων, καὶ ψυχὰς ἀνθρώπων，十八13）以及跟「地上的眾王」（十七2，十八3、9）、「地上的商人」（十八11～17）、「船主和水手」（十八17～19）等等同流合污，[43] 當中在運作執行的，並非報復，而是上主的公義：如果讀者以為帝國可以胡作妄為而無須承擔後果，約翰正要透過不斷強調上主的審判，說服讀者必須回應他的警告：「我的子民，要從她（那城）出來……免得你們受她的災禍」（十八4）。

基於上述對上主審判的理解，我們可以進一步分析啟示錄看似幸災樂禍，慶賀別人遭受暴力對待的經文。

（二）慶賀仇敵遭報

在啟示錄六至二十章，當每一系列的審判到達高潮，都有天上聖徒的敬拜和應（七9～17，十一15～19，十五3～4，十九1～8）。在這些經文中，我們找不到嘲弄或對敵人遭報的恥笑，而是對上主的救恩、公義和信

---

[40] 大部分學者都同意，淫婦坐在七座山上（十七9），是指羅馬所在的七座山。

[41] Diehl, "Anti-Imperial Rhetoric in the New Testament, " 74;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269.

[42] Collins, "Persecution and Vengeance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738.

[43]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157.

實的讚歎，[44] 焦點落在聖民持守見證之後的得救和賞賜上，而非因摧毀敵人得呈而產生的沾沾自喜。[45] 這些讚美的效用，原是要安慰和肯定信徒，他們堅拒帝國生活的努力並非徒然，上主最終必然會在苦難中報答和拯救他們。[46]

因此，雖然啟示錄十八章曾被指可能是最冒犯讀者道德感情的篇章，[47]這觀點同樣只是站在事不關己、旁觀者的立場所建構的。「伸你們的寃」（ἔκρινεν...τὸ κρίμα ὑμῶν，十八20）其實是處於不義壓迫的信徒，對掌管天地的主宰合理的期望，亦回應六章10節祭壇下亡魂的呼喊：「你不審判那些住在地上的人並伸我們流血的寃（οὐ κρίνεις καὶ ἐκδικεῖς τὸ αἷμα ἡμῶν ἐκ τῶν κατοικούντων ἐπὶ τῆς γῆς），要到幾時呢？」這種對不義肆虐橫行的憤怒，是要提醒讀者眼下情況的扭曲：「忠心聖徒還未得着平反，邪惡勢力卻享受着不配得的專權」，[48] 所以其實是值得尊重，而非要被受抨擊的情操。

事實上，書卷一方面固然並未鼓動以暴易暴，但另方面亦未選擇對世間的不義置若惘聞，而是將平反的呼聲，甚至是個人報復的慾望和野心，都在敬拜的場景中送達上主跟前，放手讓上主負責處理。所以當信徒因得着平反、公義得着伸張而「歡喜」（εὐφραίνω，十八20），這快感是來自看到上主的信實、祂的旨意最終行在人間、邪惡不至逍遙法外而產生的安慰，跟幸災樂禍、藉嘲弄受苦者來滿足個人仇怨，是截然不同的道德情操。[49]

---

[44] 尤其參七10、12，十一18，十五3～4，十九1～2。

[45] 參Carte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New Testament*, 127；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111。

[46] 參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144。

[47] Collins, "Persecution and Vengeance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737.

[48]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208.

[49] 參Kraybill, *Apocalypse and Allegiance*, 122。

所以從作者與讀者共有的世界觀出發來閱讀經文，約翰透過強調羅馬的不義行徑，激起讀者對公義和平反的渴想，同樣有着他自己的修辭目的，是要提醒讀者那能為他們爭戰的力量和資源，燃起他們的信心，肯定上主最終要介入歷史，為人平反，以致讀者亦能樂意放棄舒適的生活，拒與那將要敗亡的帝國狼狽為奸。[50]

值得留意的是，作為創天造地、世界的主宰，上主根本無需使用武力才能清除邪惡，約翰也並未高舉暴力，作為上主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

（三）啟示錄的戰爭場景

無可否認，啟示錄將聖徒要跟帝國生活劃清界線，看成是一場跟邪惡對決的聖戰。「戰爭」（πόλεμο ，十一7，十二7、17，十三7，十六13～14，十九19，二十8）和「爭戰」（πολεμέω，二16，十二7，十三4，十七14，十九11）等字眼，經常在書卷出現；像人子的基督亦稱那些能忠心忍耐到底的信徒為「那得勝的」（τῷ νικῶντι，二7、17；ὁ νικῶν，二11、26；三5、12、21），表面上似乎的確在鼓吹以戰爭來解決問題。

不過正如前文一直強調，啟示錄的語言是象徵性的。致七教會的信要求信徒「得勝」的內容，只包含「悔改」（二5、16、22，三3、19）、「作起初作的工」（二5）、「忠心至死」（二10）、「持守所有的」（二25；三11）、「遵守所領受和聽見的」（三3）以及「熱心」（三19）等，跟實質暴力和戰爭根本無關，亦呼應啟示錄十二章11節提到，基督徒得勝（νικάω）魔鬼並非是靠暴力，而是因羔羊基督的血和他們所見證的道。[51] 正如湯臣（Thompson）指出，啟示錄「聖戰」的場景，只是「屬靈爭戰」的形象化描述，當中教會要對抗的，是那些妨礙他們履行召命的威脅，[52] 所以信徒亦未有實際參與任何暴力戰鬥。

---

[50]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209 n. 6, 220.

[51] 參Barr, "John's Ironic Empire," 28。

[52] Thompson, "Reading Wha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168.

這種對啟示錄的語言和圖象的閱讀方法，亦為理解書卷十九章11至21節提供線索。在這段經文中，約翰將基督描述成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戰士；祂騎着白馬要去審判爭戰（11節），衣服濺着血（13節），口中有利劍出來（15節）。祂更要踹上主的酒醡（15節），令人想起賽六十三3當中，踹酒醡以致敵人的血將衣服染紅的恐怖景象，亦似乎在標示以戰爭來解決問題。不過，如果從約翰只是在描述屬靈爭戰的角度來閱讀，[53] 啟十九11~21同樣無需以字面意思來理解，而可以按書卷一貫的敘述風格和作者自身的神學觀點來解讀。

事實上，當我們細讀經文，整段啟示錄十九章11至21節同樣並未有任何實質的戰鬥場面，當中的「殺戮」是由基督口中的劍施行（21節），代表基督這位「上主的道」（ὁ λόγος τοῦ θεο ，13節），是以他口中的話（道），藉着勸說、審判和彰顯上主的旨意，來得勝邪惡的力量，[54] 亦正呼應祂「信實和真實」（πιστὸς καὶ ἀληθινός）的稱號（11節）。書卷戰爭的喻象，故然在標誌上主要殺敗邪惡的應許和現實，但真實的武力卻非當中得勝的方法。[55]

因此，啟示錄的戰爭場景，並非在推動以暴力作為解決人類問題的方法，而是作者修辭策略的一部分，透過將上主和羔羊（基督）以及龍和獸（羅馬政權），描述成正義與邪惡爭戰對決的雙方，作者要迫使讀者在兩個水火不容、互為排斥的效忠對象當中，作出清晰的抉擇：他們只可以從拜龍和拜獸（十三4），或者敬拜上主和羔羊基督（四至五章）之間，二擇其一；尋求同時效忠上主又跟帝國的期望妥協，並非可行之選。[56] 邪惡最終必為上主所勝而全軍覆沒，選擇與帝國為伍、跟它合作，難免要受到牽連（十八4），所以並非明智之舉。[57]

---

[53] 參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92。

[54] Carter,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New Testament*, 126;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143.

[55] Gorman, *Reading Revelation Responsibly*, 155.

[56] deSilva, *Seeing Things John's Way*, 114-15.

[57]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92.

這種從約翰原來的神學目的作起點的閱讀方法，能幫助讀經者聚焦在作者自身的角度和觀點來理解經文，而無需分散注意在一些作者根本未感興趣的關注之上。這樣，我們也可集中發掘，約翰在啟示錄所倡議的，對抗羅馬帝國的抗爭模式。

五　啟示錄的非暴力抗爭模式

如果我們以為，啟示錄最終是以暴力來決定事情的結局，我們進一步的結論可能會是，既然上主是信徒的模範，那麼信徒亦可以同樣以暴力來解決問題。[58] 不過亦如上文所言，約翰主要的焦點，並非在於上主的審判，更非暴力在當中所起的作用，而是信徒面對帝國生活看似無法抗拒的引誘，應如何抉擇，所以亦不存在對以暴易暴的推崇。

事實上，在書卷的敘述中，上主並非單獨在歷史中行動，而是藉着耶穌基督成就祂對人類世界的心意，[59] 所以基督在書卷所展現的形象，是要理解約翰本意的重要線索，尤其是在五章4至8節，約翰「聽到」要開啟書卷和七印的，是「已經得勝了」（νικάω）、「出於猶太支派的獅子」（5節），或許會讓讀者期待，基督會以強權和暴力來克勝邪惡，使敵人在武力鎮壓下屈服，但約翰最後卻「看到」一隻「像是曾被殺的（ὡς ἐσφαγμένον）的羔羊」（6節）。原來基督這位真正的君王，祂「戰勝」邪惡的方式，並非透過武力脅迫，而是藉着捨棄祂君尊的權利和力量，以自我犧牲和謙卑受苦，在十字架上成就的。[60]

因此，約翰為信徒建構去對抗邪惡的範式，是以羔羊耶穌在十架上所示範的作為藍本，以非暴力的忠心見證，諷刺羅馬帝國以武力服人的權力架構，以及普遍以武力高低來決定效忠對象的迷思。[61] 雖然約翰呼籲信徒要「得勝」，但作為領受上主和平的子民，他們要讓羔羊基督忠心

---

[58] 參例如Desjardins, *Peace, Violence and the New Testament*, 91。

[59] Koester, "Revelation's Visionary Challenge to Ordinary Empire," 13.

[60] Metzger, *Breaking the Code*, 52.

[61] 參Barr, "John's Ironic Empire," 30。

見證（ὁ μάρτυς ὁ πιστός，一5，三14）的典範，指導自己的生活（十四4），甘願成為暴力的受害者，同樣藉着在邪惡面前忠心見證，拒絕跟帝國的政治和社會系統妥協並離開罪惡（十八4），承擔可能引致的社交和經濟困境，以致能參與羔羊基督的勝利（αὐτοὶ ἐνίκησαν αὐτὸν...διὰ... τῆς μαρτυρίας αὐτῶν，十二11；亦參十五2）。[62]

所以約翰倡議的抗爭模式是非暴力的，信徒要參與的爭戰，也是屬靈而非實質的戰役。作為上主的子民，建立在基督的和平和恩典之上，信徒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見證的道（διὰ τὸ αἷμα τοῦ ἀρνίου καὶ διὰ τὸν λόγον τῆς μαρτυρίας αὐτῶν）」，甚至捨棄生命而得勝邪惡的（十二11；亦參二10，七14）。這亦解釋了為甚麼在書卷眾多審判和戰爭的敘述中，雖然上主在為信徒平反並且對邪惡施行審判，但信徒其實從未參與其中，約翰亦從未鼓勵基督徒以暴易暴，自己去施行審判。

雖然信徒要抵抗羅馬政權的威迫利誘，但約翰為他們制定的策略，並非武力抗爭，而是與罪惡清楚分開（十八4）和承受苦難。他們的「聖戰」，是以單單敬拜上主為武器，對抗周圍普遍膜拜羅馬帝國（獸）的褻瀆風氣（βλασφημία，十三1、5～6，十七3），[63]同樣是一場屬靈，而非實質武力的爭戰。

六　總結

如果我們站在旁觀者的立場去閱讀啟示錄，或許會像不少學者那樣，以為約翰在妖魔化對頭人，在鼓吹仇恨和倡議藉暴力來解決問題。

不過，一個對文本負責任的閱讀方法，必須顧及作者和讀者自身的共同視野和世界觀，尊重作者原本希望傳遞的信息。這樣，要理解啟示錄看似暴力的語言和喻象，便必須從書卷溝通雙方共同的信仰立場來閱讀分

---

[62] 參Gorman, "Shalom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284。

[63] 參Thompson, "Reading What is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167。

析，明白作者運用這些文字的修辭目的，以及他期望這些文字語言能在讀者心中產生的影響。尤其約翰用上了天啟文學的體裁來撰寫書卷，正提示我們要從象徵和形象化描述的角度，來明白他的用意。

如果對上主的全能和全然美善有足夠的信心，我們其實無需以為上主須要倚靠暴力來克勝邪惡。審判可以只是上主公義性情的合理彰顯，也是祂要履行對世界的美好心意當中的一個步驟；書卷中的聖戰場面，也無需被理解為真實的武力對決，而是對敬拜和效忠獨一真神的堅持和執着。這樣，看似在鼓勵信徒以暴易暴的經文，只要沿着約翰的思路和視野來閱讀，也只是作者在顛覆人們普遍靠賴武力脅迫來達成目的之迷思，將信徒構思成藉賴順服和自我犧牲而得勝的另類羣體的嘗試。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類從未停止以不同借口來互相攻伐，向他者施以武力傷害，我們的確須要避免讓聖經淪為推動暴力繼續肆虐的工具。

撮　　要

本文從啟示錄的體裁和整體寫作目的出發，探討作者運用看似暴力的語言和圖象的修辭目的，繼而從作者和讀者的共同神學觀點，分析這些語言對讀者所產生的效果和影響。

文章指出，啟示錄的目的是要透過顛覆性的喻象和語言，刺激讀者以另類眼光來理解周圍的政治現實，放棄眼前的政治經濟好處，持守忠心見證，堅持最後效忠上主。書卷提及的審判和對仇敵遭報的盼望，只在表達邪惡最終得以清除、公義得着伸張、上主主權得着彰顯的願景。在邪惡自招苦果的同時，亦看見上主的憐憫和慈愛，和祂最後要讓世界達至真正和平的美意。

當人普遍靠賴武力脅迫來達成自己的目標，書卷卻將基督徒構思成以耶穌十架上的示範為藍本，藉賴順服和自我犧牲而得勝的另類羣體。

ABSTRACT

This essay starts from the genre and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rhetorical purpose of its apparently violent languages and images. The effects and influence of these languages on the readers will then be analyzed from the common theological perspectives shared by the author and his readers.

The essay argues that by employing these subversive imagery and language, the purpose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to provoke the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surrounding political reality through alternative lens. It is hoped that the readers will give up what seems to be politically and economically advantageous at the moment so as to maintain their faithful witnesses and to uphold their ultimate allegiance to God. The hope for final judgment and revenge on enemies, as evinced in the Book, is no more than an expression of the vision for the final removal of evil, fulfillment of justice and revelation of God's sovereignty. While evil meets its end, God's mercy and love, as well as His goodwill and purpose for the world to achieve true peace can also be seen.

While human beings generally rely on violence and might to achieve their own goals, the Book of Revelation perceives Christians as an alternative community conquering through obedience and self-sacrifice basing on the example of Jesus on the Cross.